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 (1933—1935)

甄皓涵

内容提要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1933—1935)的关系十分重要,却始终未有详论。实则,《自由谈》改版之初本有既定路线,在主编黎烈文的摸索过程中,鲁迅、茅盾等作为著名作家被吸纳进入刊物作者群,拉开了刊物风格转变的序幕。但相较“在鲁迅引领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风格”,《自由谈》的特征更应概括为在时势与编者的推动下“偶成”的鲜明“左翼主题”。同时,“左联”虽然在与《自由谈》的互动中相对被动,却在低谷期依靠这一绝佳机会努力运营,补充血液,渡过难关。二者的互动,亦体现出了“左联”内外对其本身认知上的巨大差距,为一窥“左联”中期史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关键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申报·自由谈》;黎烈文;鲁迅

《申报·自由谈》(下文简称《自由谈》)作为《申报》的文学副刊,以较长的存续时间与多变的形式风格被时人熟知。尤以1932年12月黎烈文出任主编后(1932.12—1934.5^[1]),《自由谈》文体、文风为之一新。此时的刊物不仅深受读者喜爱^[2],也对当时的文坛、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由谈》能够产生持久影响,刊物中鲜明的左翼特征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不啻为重要因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左联”)也因《自由谈》得以宣传自身,渡过危机。由此,如何认识《自由谈》与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运动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极具研究价值的两者尤为重要。

回顾先贤论述,不论是唐弢^[3]、袁省达^[4]提出的“《自由谈》并非左翼文学阵地”的权威观点;还是述及《自由谈》中的左翼因素^[5],甚至将《自由谈》计入“左联文学创作”^[6]的最新成果,大都在宏观、举例简述的基础上,模糊地为二者关系“定性”,缺乏对《自由谈》文本及二者互动过程的深入考察,忽略了足以丰富历史认知的本相。实则《自由谈》的革新本有既定路线,“左联”亦面临非常时期的纷杂,原不相干的二者得以

联结,不能只用鲁迅、茅盾“登高一呼”而后“群起响应”粗略概述,相互关系也很难仅从“组织上的”单一向度考量。因此,重新梳理二者的互动过程与细节是做出突破的合理方向。

本文欲以前贤的研究为基础,在二者互动的视野下,充分利用《自由谈》内外文本,考订其作者群体、版面风格的变化过程,廓清《自由谈》性质的同时跳出“定性”窠臼,一并观察左翼力量怎样利用难得机会聚合发展,以期深化对“左联”中期史事的认知。

一 “左翼主题”的偶成

1932年11月30日,为纪念《申报》创立60周年,申报馆刊登改革宣言,表明“继往开来”,努力肩负社会责任的态度^[7]。众多计划中,文学副刊《自由谈》的革新计划十分醒目。此前《自由谈》由“礼拜六派”作家周瘦鹃任主编(1920.4.1—1932.12.1),他更注重“个人趣味”而非考虑读者感受^[8],多用“礼拜六派”作家的文章。《自由谈》的内容由此渐与时代脱轨,社会认可度也大幅下降,更换主编在所难免。

但《申报》经理史量才没有任用业已成名的作家或报人出任新主编，却选择了去国已久、籍籍无名的黎烈文^[9]。黎氏未入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10]，这两条应是其被选中的重要因素，于此亦能体会到史量才对新《自由谈》可以脱离“派别”、重新开始的规划与期待。

《申报》历史悠久，发行量大，其副刊与各地读者天天见面。《自由谈》主编的突然易手，也意味着编辑风格将会大变，故此事震动了上海文坛、出版界：施蛰存即在12月3日向戴望舒回信通告此事^[11]，茅盾亦称“《自由谈》的改革哄动一时”^[12]。同时，史量才委任年轻的主编进行改革，不仅需要承担黎烈文经验缺乏带来的各种问题，还要面临被撤换的周瘦鹃及其同人的非难^[13]，他对黎氏的信任与希望不言而喻。急迫的改革、舆论的压力、领导的信任、“前任”的攻讦，黎烈文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始了《自由谈》的主编生涯。

对于办文艺报刊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作者团队。黎烈文欲与“周瘦鹃时期”划清界限，寻找中意的作者为新《自由谈》撰稿，就成了首要任务。

但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前，在外已留学五年，不但手下无人可用，对国内文坛大势亦不甚了解。所以在邀集作者的问题上，他的选择是按其制定的《自由谈》改革计划“照方抓药”。施蛰存回忆黎烈文曾在1932年11月末，即新刊发稿前几日，在“福州路会宾楼菜馆”宴请了许多文坛、出版界的人物，为新《自由谈》征稿^[14]。此宴的细节恰被列席的申报馆编辑杨幸之记录下来^[15]。从杨文中可考的列席者有12人^[16]，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却均具有相当不错的创作与翻译水准——谢冰莹、张资平、施蛰存擅写小说，陈望道翻译功力深厚，曹仲渊是科学界人士，谢六逸、林语堂长于小品文，再加上四位女性，基本与黎氏的改革计划——“长篇创作，短篇世界著名小说译述，科学的故事，世界风土记，妇女和儿童的小品文字，以及幽默文字等”^[17]一一对应。这批作者也就成了新《自由谈》的首批供稿者^[18]。

翻开1932年12月1日的《自由谈》，革新气息扑面而来，不仅版式风格有了明显变化^[19]，标题下《幕前致词》^[20]（即新《自由谈》发刊词）中

通篇的“进步和近代化”也表现出欲与此前“截然两分”的态度。

黎烈文的决心与行动，使得《自由谈》气象一新，然而办刊伊始，他的编刊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来稿的数量不多且质量一般。故黎烈文一面频频刊布“投稿简章”说明需求稿件的类型^[21]，一面针对多数稿件都是“素不相识的投稿者寄来”^[22]的情况，主动出击，向名家索稿。

如12月24日《自由谈》刊出了一封编辑部信件：“蛰存兄：示悉。尊著文字优美，雅俗共赏，绝非‘鸳鸯’‘蝴蝶’之滥调可比。以后务乞源源赐稿，以饷读者为祷。——编者”^[23]施蛰存当时是著名杂志《现代》的主编，写得一手美文，此封“求稿信”无异于编者刊登的一则“变相”广告；几天后，黎氏依样画葫芦地刊出了老舍的来信，展示他约请老舍撰小品文的过程^[24]。一来二去，《自由谈》上几乎期期都有名家之作^[25]，名头也逐渐变响。

不惟如此，他的主动出击还带来了与左翼作家接触的机会。黎烈文经朋友认识郁达夫并与其熟络，

后来鲁迅先生向《自由谈》投稿，也是郁达夫先生介绍的……当时我是异常忠于自己的职务，想把刊物编的活泼有生气，各方面的佳作都一律欢迎，对于在文坛素负盛名的鲁迅先生的稿子自无例外。^[26]

与此同时，茅盾也收到了从“开明书店转来了一封《申报》的信，正是黎烈文写的，也约我为《自由谈》写稿”^[27]。

但黎烈文对当时文坛的了解仍很有限，向鲁迅、茅盾约稿无外乎他们“素负盛名”，与此前邀来的张资平、施蛰存、老舍等人区别不大。同样，茅盾与鲁迅在面对陌生的文坛新人约稿时亦充满疑虑，茅盾即难以理解“既要改革《自由谈》为什么要找到张资平，而且接编的第一天就登载张资平的长篇小说”，之后才转变想法，认为“既然他来约稿，应该试试看。而且左翼作家如能在这上海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28]。鲁迅也保持了一段观望态度，直到不久后了解到“黎烈文忙于编务，无暇照顾夫人致其难产而死”，受其感召才开

始为《自由谈》投稿^[29]。

于是,1933年1月30日,鲁迅在《自由谈》的第一篇文章终于发表,当日版面上也刊布了那则著名的“编辑室启事”:

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30]

随着鲁、茅二人的加入,《自由谈》与“左联”的关系也拉开了序幕。鲁、茅二人加入《自由谈》初期,刊物的风格却远非后世认知中的“典型”状态:1932年12月,也即《自由谈》革新后的首月,整个刊物的讨论基本围绕着从社会层面讨论爱国、进步与妇女解放问题,附以海外奇闻轶事与新知的传播。为了吸引读者,编者更是在几篇女作者关于“爱情”的文章后,发起了以“爱是有条件的嘛?”为主题的讨论,希望青年男女就此发表意见^[31]。显然,这种关注个人层面的“进步与现代化”或许更接近于“五四时期”,而非“主义盛行”的30年代^[32]。茅盾为《自由谈》撰稿之初,限于刊物的整体风格,又摸不清革新的力度,主题选择上只能说是中规中矩,12月27日的《“自杀”与“被杀”》、1月8日的《紧抓住现在》都是泛泛谈论国民与国家。实际上,《自由谈》转向激烈论政与批评政府的风格,是“时势”与“编者”共同造就的。

1933年1月3日,山海关被日军占领,一时舆论哗然。1月10日,《自由谈》一改以前很少论政的文艺风格,在版面的边角上发表了署名“徐尚周”作的《后盾》,讽刺山海关失守,国难当头之时,无人做“前驱”,却人人争做“后盾”^[33]。一“文”激起千层浪,其后不仅每日的《自由谈》头条多是围绕日军侵略,批判政府抵抗不力的杂感类文字,头条外的文章也时有涉及。尤以任临时主编^[34]杨幸之的多篇文章较为突出,如《拿事实来》讽刺张学良面对日军进犯不战不守,一再退至山海关;《呼吁和平》就汪精卫在日内瓦发文呼吁和平而辩驳,认为此刻之世界无法呼吁和平;《“不准动”与“偏要动”》则直指政府要求人民安定,“不准自由”^[35]。杨氏连编带写,使《自由谈》风格一变,黎烈文重回主编岗位后,对这种

新风格不但未加抑制,反而极为鼓励。

随着舆论环境改变,鲁迅与茅盾的杂文也愈发辛辣,“航空救国”“长期抵抗”“迁移古物”都成了被广泛讨论的主题,此唱彼和之下,刊物上论政的杂感蔚然成风。不但专攻杂文的新作家频繁涌现,连郁达夫、韩侍桁、老舍、施蛰存等之前在《自由谈》只写散文、小品文的作家,亦开始发表辛辣的杂文讽刺当局。1933年2—4月,观察每日《自由谈》标题下的“头条”,若非名家之作,即是讽刺文章,格外抓人眼球,刊物的“头条杂文”模式就此基本成型。甚至个别期中除了张资平的连载长篇小说外,皆是论政之作。这种风格的形成,若不是主编的强烈意愿,仅凭个别作家之力是难以完成的。此时的《自由谈》,不仅刊内讨论火热,刊外也深受读者欢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不过好景不长,在对左翼文化、言论钳制相当严厉的年代,如此激烈的批判政府,《自由谈》将不仅受到《社会新闻》等官媒的“陷构”^[36],更要直面上层的政治压力。

1933年5月6日,《自由谈》刊布了一则与半年前改版初期几乎相同的征稿告示,但此时的《自由谈》不仅稿源不愁,甚至稿件“积存过多”^[37]。此处的告示与其可视为“征稿”,毋宁说是编者受到压力,意欲将风格改回从前的委婉表达。5月11日,《自由谈》的头条是茅盾的《“给他们看什么好呢?”》^[38],讨论应如何编译儿童读物的问题,但类似风格的文章其实已几个月未在刊物头条出现了,变化的到来可谓“初现端倪”。

终于,5月25日《自由谈》刊布了著名的呼吁“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编辑室公告^[39]。此后,《自由谈》风格便产生了较大转变,鲁迅就将这前后自己的杂文分别命名为《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观察此后几期的刊物亦可体会这一变化:之前充斥版面的论政文章,多转变为教育或纯粹文艺问题的讨论;之前杂文的写作者,如廖沫沙写起了从未写过的小说;而几位与黎烈文较熟的《自由谈》的头牌作家,对这一转变都迅速做出了反应——茅盾、郁达夫^[40]或早已接到黎烈文的通知,很快改换了风格^[41];鲁迅则搁笔了长达20天^[42],才启用新的笔名,以一篇《夜颂》^[43]开始

了“带着枷锁的跳舞”。

诚然，“谈风月”后《自由谈》上的文章，不仅讽刺力度大大减轻，批判主题不再直接，形式上也再次贴近改版初期，但笔者认为此时刊物的风格却在走向成熟。几个月的发展，《自由谈》中已蕴蓄了“左翼论述”的星星之火，例如早在1933年1月17日，当天的头条是一位署名子谷的作者所写的《发动民族革命战争》，认为面对日本的侵略，列强却为日张目，国人不应向魔鬼乞怜、安坐等死，而应发动民族革命的战争，建立“联合战线”^[44]。5月4日，身为“左联”成员的覃晓晴发表文章《纪念五四》，她对“五四”前近代史的分析，基本参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方法^[45]。正因为有此基础，当写作迫于政治压力只能以含蓄的曲笔进行之时，刊物主题也就顺其自然转向了更成熟而隐晦的“左翼文艺”的讨论。

此后的6月，茅盾与曹聚仁谈论“回农村去”的问题^[46]，魏猛克歌颂大众艺术^[47]，署名犬马的作者讨论丁玲的《母亲》^[48]，皆为此例。至7月时，此类文章日渐增多：批评其他流派作品者有之^[49]，推介左翼作品与刊物者有之^[50]，讨论写作方法、文艺理论者有之^[51]……“左翼文艺”的讨论宛如涓涓细流聚而成川，7月的《自由谈》已初具之后两年刊物的形态了。

论政文章多关乎时事，写作门槛远低于对于文艺问题的讨论，所以从这两个月的《自由谈》中可明显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作者群中的热心读者渐少，左翼作家却多了起来。也正是经历了“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外界压力后，《自由谈》的风格才算真正成型。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自由谈》的改革本有既定路线，“左翼主题”的产生实际上有较大的偶然性。在编者“摸着石头过河”的编刊过程中（1932.12—1933.1），鲁迅、茅盾作为著名作家被吸纳进入作者群；刊物上“爱国主题”的出现（1933.1—1933.5.25）与时势发展关联紧密，但当限于政治压力而不得已转入隐曲表达后，“左翼文艺”的探讨（1933.6—1935.10）也就成了合乎情理的转变。而鲁、茅二人更多是在编者的努力下，起到助力之功。

二 “编者主导”：黎烈文的倾向与选择

《自由谈》从改版初期到两次转变，尽管外界因素（时势影响、当局压力）不容忽视，但主编黎烈文的主导——其对作者群体的迎拒与内容的选择，无疑对刊物的风格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牌作者是一份报刊的招牌与门面，黎烈文在办刊之初就很注意维护与各位大牌作者的关系^[52]。茅盾、鲁迅加盟《自由谈》之初，并未打算在刊物上撰文太久^[53]。可黎烈文却对二人异常重视：鲁、茅刚登刊物，黎氏即“广而告之”，提醒读者注意；对于二人的稿件，黎氏不仅“来稿必发”，且都安排在当日头条；给鲁迅的稿费也要高于刊物的正常标准^[54]。私底下，黎烈文还经常与鲁迅通信或面谈，向其请教关于编刊的诸多问题；甚至曾主动邀请他连载长篇小说，代替张资平曾经的位置^[55]。

在意识到鲁迅与茅盾给《自由谈》风格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之后，他还在版面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刊物更呼应他们的风格。

前文所述，改版之初的《自由谈》尽管能依靠黎烈文拉来的大牌作者支起门面，可稿件数量却远不够充实整个版面，因此社会来稿就成了早期《自由谈》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稿件大部分源于《自由谈》的热心读者，他们或欣赏报刊风格或关心部分论题而投稿^[56]，但囿于写作水平或时间不足，他们多不能持续提供高质量的稿件。黎烈文虽然乐于采纳这些文章，但却有意识按一定原则筛选稿件，并主动扶持新人。

在稿件的筛选上，黎烈文选择的标准往往倾向与鲁迅、茅盾杂文的论题呼应之作。比如1933年2月13日，周敬济的《奇文共赏》^[57]，内容完全呼应鲁、茅这两天讨论的北平政府“迁移古物”的问题，其文中的大段引文更是当期头条鲁迅《战略关系》^[58]文中报纸文摘的完整文本，有周氏一文配合，读者阅读鲁迅文章时也就不致云里雾里了。再如一位署名“伧”的作者^[59]，其1933年在《自由谈》发表的三篇文章，主题或内容都牵涉到了

鲁迅。

《自由谈》以其出色的“造血能力”而被后世称道^[60]，许多新人经此崭露头角，其中最典型的如徐懋庸与唐弢，此前都是几乎没有发表经验的文学青年。他们正是由于善写“鲁迅风”的杂文，而被黎氏青睐并鼓励投稿^[61]。这些作家日后也都成了《自由谈》的“台柱”，巩固了刊物的风格。

晚近报刊通过炒作论争吸引关注可谓常规手段。黎烈文在编刊过程中一面刊发论争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一面则借之保护旗下的作家。

新《自由谈》的首次论争即由茅盾引发。1933年2月，他用笔名“阳秋”讽刺曾今可等人的“词的解放运动”^[62]，紧接着《自由谈》上连续刊载了近10篇与茅同调的批评，为其助拳。同时，茅盾又因为在讨论中讽刺了胡怀琛的学术观点^[63]，引起胡氏不满，被要求公开道歉^[64]。黎烈文虽然看似公允的主持讨论，可却一直在“拉偏架”，不但刊发了两篇“托古”的文章^[65]，还附言讽刺胡氏学问不好、心胸狭窄、小题大做，胡怀琛吃了闷亏，只能悻悻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黎对于鲁、茅的支持还表现在刊物内部的论争上。1933年9、10月间，《自由谈》发生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庄子》与《文选》之争”，论争双方鲁迅与施蛰存都是在该刊上发文较多的作家。虽然起因只是一个提倡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的小问题，且社会上支持施蛰存的声音不少，可这场论争在《自由谈》上却出人意料地一边倒。孤军奋战的施蛰存被数位作家“围攻”^[66]，最后惨烈收场。

黎烈文通过报刊“内外”的努力，使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在《自由谈》中如鱼得水，更多“左联”作家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逐渐以个人或集体名义进驻刊物，成为了本时期《自由谈》的一个重要特征。笔者对这一时期刊物的作者与笔名进行了简单钩稽统计，曾在《自由谈》发表的“左联”作家可谓人数众多——“左联”后期在上海活动的盟员基本都有此经历。而该刊的作者总量本就不算庞大^[67]，再拨开笔名的迷雾，就会发现左翼作家无论从作者数量到发文数量都构成了这一时期刊物的主流^[68]。鲁迅曾在1933年10月收到甘肃文学爱

好者王熙之投稿的来信，从他的回信可推知，这位身处内地的读者将鲁当成了《自由谈》的编者^[69]，刊物带给人的观感，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自由谈》改版初“兼容并包”^[70]的风格却受到了很大影响，叶圣陶、林语堂、施蛰存等非左翼作家在《自由谈》上露脸越来越少，只在遇到感兴趣的题材时前来客串。而章克标、林徽音、韩侍桁等与鲁迅有矛盾的作家能在《自由谈》上撰文不少，也仅是因为黎烈文当时并不清楚他们与鲁迅的过节^[71]。

在编者黎烈文的主导下，左翼作家与曹聚仁、陈子展等“亲左翼作家”得以聚合出协同的声浪，《自由谈》也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以“左翼论述”为主题的集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之称为左翼文学的一块重要阵地，其实并不为过。

然而考察黎烈文渐而倾向左翼的动因，却可发现，他的初衷与目的都是为办好刊物，“左翼主题”的时髦与热销则恰为助力^[72]。他与左翼作家们因编刊而升温的个人交谊，进一步促使刊物风格定型。但从黎烈文离开《自由谈》后的工作往来与日后远赴台湾等举动看，他与“左联”或共产党组织却始终有距离。因此，黎氏对于左翼文学的认知围绕以鲁迅为主的个别左翼作家生成，与其说他亲“左”毋宁说他是亲“鲁”。所以“左翼主题”虽在《自由谈》上茁壮发展，根源却与其他左翼阵地大异其趣——“左翼主题，编者主导”适可作为《自由谈》特点的概括。这种以中立编者为主导形成的左翼阵地，可谓左翼宣传中一种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形式。

三 《自由谈》内外的“左联”

虽如上述，编者在《自由谈》“左翼主题”的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若无左翼作家们的积极呼应，刊物上的左翼盛景亦难形成。作为左翼文学运动核心组织的“左联”，在互动过程中虽非主导，却未缺席。不过，“左联”内部层次复杂，鲁迅、茅盾等“明星作家”不能与一般盟员单纯等同（他们作为“左联”的“象征”，日常行为中多独立于组织。不参加盟员基本的组织生活^[73]，只在重要活动时参与决定、发言^[74]），由此站在鲁、

茅之外的“左联”组织立场，观察他们如何围绕这一偶然又难得的机会展开运营，对于理解二者的互动过程极为重要。

“左联”初期发展迅猛，随后便遭受国民党的残酷压迫，不得已进入低潮期。尤以1931年“五烈士事件”后，“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75]。

是时，“左联”旗下作家大多沉寂，各自为战。许多盟员在当局的大肆抓捕下革命意志日渐消沉——王任叔^[76]、黄芝冈^[77]即在1932年被捕出狱后另谋他路，甚至为国民党机关工作；文史功底较好的作家则东躲西藏，靠革命外的撰文、编书糊口，比如钱杏邨——“阿英”即是他在此阶段启用的众多笔名之一^[78]；大多数青年作家不敢公开就业，为组织工作没有报酬，又不像成名作家可靠写作谋生，“生计无着”是他们的真实写照^[79]。“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80]，吃不起饭是平常事情^[81]。

紧张的政治环境下，“左联”的权力中枢亦在发生微妙变化，本是沟通上下的“左联党团”逐渐统摄了行政系统^[82]。但即便新领导层迅速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83]，可限于当局的严密封锁，“‘左联’工作基本是敷衍塞责的过日子，盟员间如一盘散沙”^[84]，组织名义下的刊物刚出几期便被查禁。如此下去，“左联”无论在政治宣传与文艺创作中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补充盟员队伍与拓展宣传空间的问题亟待解决。

1932年末《自由谈》恰逢其时的改版，则为从丁玲开始的“左联”党团领导层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不过左翼作家大规模进驻商业性报纸副刊并无先例，鲁迅、茅盾两位著名作家尚且思忖再三，“左联”组织起初也只是以观望为主。

除鲁迅、茅盾外，率先尝试在《自由谈》发表文章的是与组织沟通不紧的左翼作家们，稿费是驱使他们投稿的主要因素——《自由谈》稿酬虽不算多，每月10圆左右却可贴补生活。为被顺利录用，他们的写作多呼应《自由谈》近来的主题，较典型的有彭家煌、王任叔。1933年2月，丁玲主动向《自由谈》推荐青年作家李辉英，也是因为他实在

没有生活来源，为《自由谈》写小品文能解决其食宿问题^[85]。以往左翼刊物的“宣传效用”与此时发表文章的迫切相比，难免位居其次。

自从盟员大量丧失，“左联”就一直在试图发展新力量。以艾芜为例，“左联”党团的领导在偏左翼的刊物上搜罗文笔不错的左倾作家，借助盟员的交谊网络或主动联系，介绍他们加入组织^[86]，这种与报刊联系紧密的模式成了“左联”中后期“造血”的重要途径^[87]。《自由谈》逐渐生成的“左翼主题”培养了大批左翼作家，亦为“左联”高层发展盟员提供了新土壤。

“先入《自由谈》，再入左联”的作家可分两种：其一如廖沫沙、徐懋庸，他们此前曾参加过革命活动，却暂与组织失去联系，依靠写作谋生：廖沫沙经陈子展介绍为《自由谈》写稿，周扬听说他的“文名”后，邀请其为“左联”阵地《中华日报·动向》撰稿，廖氏由此进入了组织^[88]；徐懋庸则是自己主动向《自由谈》投稿，引起“左联”的注意，被任白戈联系到并介绍加入“左联”^[89]。其二如魏猛克，虽无革命经验但思想左倾，通过在《自由谈》上发文，为进入“左联”积累了关键经验^[90]。《自由谈》的“左翼主题”让左倾作家崭露头角，他们或有革命经历，或是思想左倾，使得“左联”无需经过复杂漫长的审查流程就能补充新鲜血液。且对于这些“文学青年”而言，加入“左联”或可恢复组织关系，或能从事革命工作，使得他们在转向“革命青年”的路上更进一步。

“左联”中后期作家中新人较多，亦急需刊物提供锻炼空间^[91]。故《自由谈》不仅是“左联”拔擢新人的渠道，也是盟员们写作练笔、走向成熟的重要阵地。魏猛克曾回忆道：“左联通过学习讨论，组织很多人用散文、杂文形式写了很多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斗争的文章。文章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以及《太白》等杂志上。”^[92]不像单独行动的作家们为了稿费“各自为战”，自1933年6、7月份《自由谈》的“左翼主题”逐渐成型后，“左联”旗下集体行动的作家，如周立波、艾芜、穆木天、草明、周文、欧阳山等有组织性地出现在了《自由谈》上，

他们的投稿不但数量巨大,且文类齐全(杂感、小说、散文、诗歌、译作),宣传作用很强,“左联”的内部引导可谓颇具成效。渐渐地,《自由谈》对于“左联”已不可或缺,徐懋庸即回忆道:“我那时是‘左联’理论研究会的一个组员。这时候《自由谈》被国民党反动派所迫停刊,‘左联’想办一个半月刊,代替《自由谈》这个阵地。”^[93]

《自由谈》上的“左联”同路人帮助营构起了“左翼主题”,“左联”领导层同样重视维系与他们的关系。比如徐懋庸加入“左联”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团结非‘左联’的‘进步作家’”,他负责的有唐弢、曹聚仁、周木斋、陈子展等人^[94]。此项工作收效显著,这些作家在《自由谈》外仍然维持着与“左联”的密切关系,“左联”后期的刊物中,他们的文章作为盟员之外的一股重要力量支撑着刊物。

观察经历了《自由谈》洗礼后的“左联”,无论是盟员的投稿途径(商业刊物渐多)与文风(“鲁迅风”杂文的风行),还是新出刊物风格与作者团队,都可见“《自由谈》经验”留下的深刻印痕,进而言之,《自由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左联”后期的整体风格。

余 论

通过以上对《申报·自由谈》与“左联”二者互动关系的梳理,不难发现,《自由谈》从革新之初到呈现最终样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于其他“左翼阵地”,在此,时势变化、政治压力与编者黎烈文都对刊物形成鲜明的“左翼主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这阶段《自由谈》特点可概括为“左翼主题、编者主导”;对于“左联”而言,《自由谈》这个多少来自意外的阵地,为其带来的宣传空间与盟员补充渠道,对自身渡过困难的中期至关重要。同样,“左联”作家在《自由谈》上的活跃表现,也为刊物的风格形成起到了最大助力。

但回顾整个互动过程,亦不难发现“左联”内外对鲁迅等“明星作家”的体认差距。社会层面上,鲁迅不仅是“明星作家”,更是左翼文学运动

的“金字招牌”。若无鲁、茅二位的筚路蓝缕之功,“左联”与《自由谈》间的化学反应如何,或许得画一个问号。即便鲁迅“无心插柳”^[95],左翼势力仍可借其影响在《自由谈》上快速发展——黎烈文等编辑因亲“鲁”而亲“左”,以曹聚仁为代表的亲左作家引鲁迅言论为同调,甚至国民党的报纸也称鲁迅沈雁冰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台柱”^[96]。以至于左倾“文学青年”多曾受鲁迅的影响,对其拳拳服膺且渴盼亲炙^[97]。

因此在1933年前后,发展至瓶颈期的“左联”不仅依赖鲁迅打开报刊空间、引领讨论,更需要与鲁迅精神关系紧密的“文学青年”来补充革命队伍。但在“左联”内部,文人们对于鲁迅虽然非常倚重却又缺乏尊重,“文学青年”们进入“左联”后多也逐渐意识到鲁迅与“左联”代表的党之间难以弥合的分歧^[98]。“左联”与鲁迅这对起初即有裂痕的结合,到了非常时期由年轻一代共产党人掌舵时,也呈现出了比以前更深的隔膜,左翼文学运动的本质由此愈加发人深省。

如何“传播革命”是“左联”研究、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所在。通过本文可知,左翼论述在当时拥有广大市场,非左翼出版机构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推进与参与不仅只在刊发禁书,过分集中于组织名义出版的刊物无疑会丧失诸多面相,也很难对“左联”历史有恰当评价。由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尝试突破:或“返回时代”——跳出后见立场,从“左联”外部、社会立场观察“左联”,站在每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语境,充分考虑他们掌握的不对等信息,廓清已成定论的疏漏,以深化对于左翼文学运动的复杂性认识;或“扩大视野”——重读久被忽视的各种非左翼报刊,从中搜集左翼作家佚文与左倾言论,钩稽其中的草蛇灰线,补充叙述不足的“左联”中期史事,连接前后。两点管见,笔者惟愿抛砖引玉,呼吁学林同好在挖掘新材料的同时,重视如《自由谈》等仍有开发潜力的老材料,回应文学史中的重要问题。

[1] 黎烈文的任期虽然只从1932年12月1日到1934年5

月9日，但其继任者张梓生（1934.5—1935.10）基本“萧规曹随”，刊物的作者群体与风格变化不大，论者多将二人主编时期合并对待（详见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本文将更侧重黎烈文在任时，并将张梓生时期的一年视为黎的延续，为求简便，后文中提及的《自由谈》，除非特殊提示，均指涉这一时期。

[2] 曹聚仁：“我在北京东安市场书摊上看见过一本《自由谈》合订本，就从黎兄主编那天开始，到黎兄离职那天为止，剪贴而成，标价三十元，可见这位读者如何看重黎兄的分量了。”详见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第3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60] 详见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申报自由谈目录（1932.12—1935.10）》，第2—5页，第10页，上海鲁迅纪念馆1981年版。

[4] 详见袁省达：《申报〈自由谈〉源流》。

[5] 诸如“左联作家的作品在《自由谈》上确实蔚为壮观”（详见王儒年：《疏离与融合：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上海地方社会》，见许纪霖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自由谈’作者群体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政党文化有很大程度的渗透”（详见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 详见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书中将《自由谈》称为“以各种非左翼报刊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

[7] “九一八”事变后，申报经理史量才受到“国难”与陶行知、黄炎培等人的双重影响，思想渐趋激烈，《申报》上的爱国言论与政府批评愈发直接。（详见刘永生：《〈申报〉禁邮及“自由谈”改版事件》，《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1932年《申报》与《自由谈》革新，正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此条感谢专家评审提出的建议）。

[8][19] 牟利峰：《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鲁迅后期杂文的生成（1927—1936）》，博士学位论文，第82页，第83—84页，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年。

[9]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后又留学法国。1932年黎氏携夫人从法国留学回国，甚至“回国后还没到湖南老家省亲，就于十二月一日接编了《自由谈》”（详见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10] 黎烈文自述膺选的原因：“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编辑《自由谈》”（详见黎烈文：《黎烈文启事》，《时事新报》1933年7月7日）。

[11] 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第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2][27][28] 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

[13] 尽管为安抚周瘦鹃，从1933年1月起，史量才在《申报》中另辟增刊《春秋》交给周氏编辑，但周氏仍“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微知：《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社会新闻》1933年第2卷13期）。

[14] 施蛰存：《〈自由谈〉旧话》，载《北山散文集》第1辑，见刘凌，刘效礼编：《施蛰存全集》第2卷，第4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 星子：《写于杯盘狼藉之后》，《申报·自由谈》（后简称《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16] 杨幸之的文章中说明了参宴的共24人，提及具体姓名的有李大超与夫人王孝英、陈望道与夫人蔡葵、胡愈之、谢冰莹、林语堂、张资平、谢六逸、高之谦、杨幸之、施蛰存（由氏著《〈自由谈〉旧话》可知他也在席）、黎烈文。

[17] 《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纪念本报六十周年》，《申报》1932年11月30日。

[18] 诸如12月1日的第一期《自由谈》作者有黎烈文、冰之（黎烈文夫人）、谢六逸、杨幸之（星子）、谢冰莹、张资平、叶圣陶。除叶圣陶都确定被黎烈文宴请。

[20] 黎烈文：《幕前致词》，《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21] 如12月2、3日接连刊布：“①四百字以内，意味深长之幽默文字。②翻译短篇世界名著。③内容充实和有艺术价值之短篇创作小说。④对于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字。⑤科学家轶闻，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⑥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之记述。⑦文字优美且具特殊见地之游记印象记等。”（《投稿简章》，《自由谈》1932年12月2日）

[22] 《编辑部启事》，《自由谈》1932年12月12日。

[23] 《编者致施蛰存信》，《自由谈》1932年12月24日。

[24] 《老舍致黎烈文信》，《自由谈》1933年1月1日。

[25] 巴金亦有回忆：“我和烈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还在编辑《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他托人向我

约稿,我寄了稿去,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巴金:《怀念烈文》,《巴金全集》第16卷,第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6]黎烈文:《关于郁达夫》,见陈子善编:《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郁达夫笔下的名人》,第157—15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9]详见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0]《编辑室启事》,《自由谈》1933年1月30日。

[31]编者附《爱是无条件的吗?》后,《自由谈》1932年12月13日。

[32]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3]徐尚周:《后盾》,《自由谈》1933年1月10日。

[34]由于黎烈文妻子难产而死,故两句以来一直由杨幸之代编。见《编辑室启事》,《自由谈》1933年1月24日。

[35]杨幸之:《拿事实来》,《自由谈》1933年1月11日;《呼吁和平》,《自由谈》1933年1月14日。《“不准动”与“偏要动”》,《自由谈》1933年1月21日。

[36]《社会新闻》对黎烈文与其所编的《自由谈》的关注相当持久,仅1933—1934年期间,笔者就发现了10多篇相关新闻,且论调极为一致,即强调黎烈文与《自由谈》与左翼、左联的关系。

[37]《编辑室公告》,《自由谈》1933年3月15日。

[38]玄(茅盾):《“给他们看什么好呢?”》,《自由谈》1933年5月11日。

[39]《编辑室公告》,《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40]由1933年3月7日《编辑室复读者信》(《自由谈》1933年3月7日),可知阳秋(茅盾笔名)先生经常去自由谈编辑部。郁达夫则是黎烈文回忆中所记,与黎氏常有私人来往。详参注26。

[41]郁达夫也在告示发表之前就做出了改变,郁达夫:《著书与教书》,《自由谈》1933年5月22日。

[42]《330527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9页。

[43]游光(鲁迅):《夜颂》,《自由谈》1933年6月10日。

[44]子谷:《发动民族革命战争》,《自由谈》1933年1月17日。

[45]静子(覃晓晴):《纪念五四》,《自由谈》1933年5月4日。

[46]郎损(茅盾):《现代青年的迷惘》,《自由谈》1933

年6月12日;曹聚仁:《我的迷惘》,《自由谈》1933年6月14日;郎损(茅盾):《青年们的又一迷惘》,《自由谈》1933年6月15日。

[47]猛克(魏猛克):《中国艺术界》,《自由谈》1933年6月26日。

[48]犬马:《读〈母亲〉》,《自由谈》1933年6月30日。

[49]小雪(阿英):《读书琐记》,《自由谈》1933年7月4日、6日、13日。凤吾(阿英):《旧书新话》,《自由谈》1933年7月10日。

[50]另境(孔另境):《读“文学”创刊号》,《自由谈》1933年7月12日。秀侠(祝秀侠):《介绍〈无名文艺〉中的两篇创作》,《自由谈》1933年7月18日。凤吾(阿英):《关于“丰灾”的作品》,《自由谈》1933年7月28日。

[51]古飞(胡风):《作家与草莓》,《自由谈》1933年7月14日。小雪(阿英):《读书琐记》,《自由谈》1933年7月16日、22日。

[52]如12月26日《自由谈》刊布了一则编辑室“回信”:“毓英先生:示悉。见教极是。关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儿童生活’的片段描写,我们非常欢迎。(但要写得‘美’而‘短’)其余各项,因为改革不久,有许多困难,暂时还做不到,乞谅之。——黎烈文”(《编辑室致江天蔚、周毓英信》,《自由谈》1932年12月25日)。《自由谈》的每封“公告”都有其“言外之意”,此信前半段似意在强调刊物鼓励的稿件体裁,但后半段“其余各项”既未明言建议内容,又无采纳之意,似无需公开回应。不过联想到收信的周毓英,曾在与张资平合办乐群书店时闹翻,黎氏通过“拒绝周毓英”以示好当时的“台柱”张资平,因之合情合理。值得一提的是,周毓英同样曾被“左联”开除,不过考虑到开除周的告示《文学导报》极不易见,且周与左联的这层关系,非左联盟员很难得知,黎烈文对此应并不了解(被“左联”同时开除并公布的叶灵凤的文章却被《自由谈》接纳亦是一证)。

[53]《330331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6页。

[54]陈明远曾通过鲁迅的日记与书信订出《自由谈》给鲁迅的稿费是“千字6圆”,这一标准要高于《自由谈》正常标准“千字2圆至5圆”。详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10—1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5]《330803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430页。

[56]比如一名叫做江天蔚的作者,曾在《自由谈》上发表了4篇文章,他回忆自己1932年时正居住在杭州,因为读

到了改版当天的《自由谈》而“精神十分振奋”，因此下决心向刊物投稿，而他本人不但不是文坛知名人士，与黎烈文也并不认识（江天蔚：《我和申报〈自由谈〉的一段因缘》，《西湖》1982年第11期）。

[57]周敬济：《奇文共赏》，《自由谈》1933年2月13日。经考证，此君是为了周济生活的业余写手（详见周敬济：《我的生活费支配法》，《机联会刊》1933年第67期）。

[58]何家干（鲁迅）：《战略关系》，《自由谈》1933年2月13日。

[59]经考证此人真名李守章，字俊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开始文学创作。后迫于生计辗转北方，1930年任北方左联筹委会秘书长，1931—1937年在济南教书，并进行进步活动（详见李卜森：《联合抗日阵线的“才子司令”——父亲李俊民投笔从戎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编：《民族脊梁——父亲的抗战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可谓“无名之辈”投稿《自由谈》成功的典型范例。

[61]徐懋庸：“有一天，翻翻《申报》，从《自由谈》上何家干（笔者按，鲁迅）的一篇文章，忽然有所触动，也写了两篇短文，寄给《自由谈》编辑部。不过是试一试而已，并无一定会被采用的信心。不料几天以后，《自由谈》竟发表了那两篇东西，编者黎烈文，在寄稿费的同时，还写信给我，说是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我再写。大概因为我的杂文的风格，颇与鲁迅相近之故吧。”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2]阳秋（茅盾）：《读〈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后恭感》，《自由谈》1933年2月7日。

[63]玄（茅盾）：《何必“解放”！》，《自由谈》1933年3月10日。

[64]胡怀琛：《致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先生信》，《自由谈》1933年3月16日。

[65]晓风：《柳宗元要求胡怀琛更正道歉》，《自由谈》1933年3月18日。

[66]计有鲁迅、陈子展、茅盾、徐懋庸、曹聚仁、王任叔、高植、梁园东、周木斋，其中鲁迅更是先后用了4个笔名发文参与争论。

[67]如热心读者吉焕来信说：“贵谈撰稿人实际并不多”，这个观察还是建立在他并未意识到许多文章其实是同一作者用不同笔名撰写的基础上的（详见吉焕：《读者来函》，《自由谈》1933年8月23日）。

[68]《自由谈》中笔名众多，少数笔名难以核查，故此处只统计发文5篇以上的作者。经统计，此期间撰文5篇及以上作者共计107人，撰文3071篇。左联成员占40人（37%）（这里并不包括曾加入但撰文时已不在左联的叶灵凤、韩侍桁、杜衡、谢冰莹、郁达夫等；也不包括当时已加入党组织，却未加入左联的孔另境、李筱峰、李乔等）撰文1336篇（44%）；左联与“亲左”人士（组织、言论上的同路人，包括曹聚仁、陈子展、唐弢等）共计73人（68%），2421篇（78%）。而左联盟员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的作家共计53位（发文时仍属左联），1368篇。左联与亲左成员发文用的笔名数量更是巨大，仅精确可考的就有193个，加上不可考的与发表篇数较少的左翼言论笔名则数量将会大大增加。

[69]王熙之来信已不存，鲁迅回信详细内容为：“熙之先生：九月十六日惠函收到，今天是十月二十一日，一个多月了，我们住得真远。儿歌当代投杂志，别一册俟寄到时，去问北新或别的书局试试看。《自由谈》并非我所编辑，投稿是有的，诚然是用何家干之名，但现在此名又被压迫，在另用种种假名了。至六月为止的短评，已集成一书，日内当寄奉。”（《331021致王熙之》，《鲁迅全集》第12册，第465页）

[70]唐弢称《自由谈》为“‘五四’以来一个最讲究广泛团结，真正做到‘兼容并包’的刊物”，与鲁迅有矛盾的作家也能在上面频频发声（唐弢：《〈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第3—5页）。这一观点是《自由谈》性质的最权威论述，影响持久，近来仍多有沿用（如李娟：《中国近代报刊公共空间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困境——以1932年〈申报·自由谈〉为例》，《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

[71]章克标自鲁迅批评了他的《文坛登龙术》后，在《自由谈》上就不再活跃了（苇索（鲁迅）：《登龙术拾遗》，《自由谈》1933年9月1日）；林微音虽然常化名写文章讽刺鲁迅，可他在《自由谈》上毫无此举，就连鲁迅没意识到林氏竟是批评过他的陈代（详见唐弢：《断片》，唐弢：《唐弢文集》第6卷，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韩侍桁与鲁迅的矛盾则是在1933年韩被划为“第三种人”前，除了他们本人，外界都不知情（详见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72]在当时，左翼不仅是“进步与现代化”的代表，与《自由谈》革新的方向接近，且左翼文学在社会上的广受热捧带来的阅读量与巨大收益，使出版界不惜面对政治压力

而去与他们合作。此问题已多有研究,可参见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第198—199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2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73]王宏志:《鲁迅与“左联”》,第47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74]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段回忆》,《左联回忆录》(后文简称《回忆录》),第130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75]茅盾:《关于“左联”》,《回忆录》,第120页。

[76]详见王任叔:《自传》,《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77]详见《精通民俗学的戏曲史家——黄芝冈》,见邹世毅编:《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戏剧家卷》,第140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周楞伽:《记阿英》,见周楞伽:《伤逝与谈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9]如左联高层成员周扬孩子得肺炎看病,甚至日常坐车都需要向盟员借钱(详见任钧:《关于“左联”的一些情况》,《回忆录》,第195页。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回忆录》,第190页),此例不知凡几。

[80]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回忆录》,第190页。

[81][85]李辉英:《写点小品文罢》,见陈望道编:《小品文与漫画——〈太白〉一卷纪念特辑》,第77页,生活书店1935年版。

[82]详见张广海:《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第141—143页,香港三联书店2017年版。

[83]详见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43—144页。

[84]胡风:《胡风回忆录》,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86]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见艾芜:《艾芜全集》第11卷,第36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87]一些作家即如此加入左联,如李辉英(详见《李辉英传略》,载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叶紫(《叶紫小传》,见叶雪芸编:《叶紫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作家也用此途径或自身人际网络邀请新作家加入左联(叶紫介绍了魏猛克和齐速加入、主动联系在《无名文艺》上投稿的黑婴)。有

必要澄清的是,在加入左联前,不少盟员与其介绍人都有私人交谊,如魏猛克与介绍人叶紫曾是同学,但其《自由谈》作者身份亦是他终得加入“左联”的重要因素。对于左联而言,增补盟员的政治倾向与文学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偏左翼刊物的青年作者群恰是一个便利渠道,私人交谊固然关键,但发表经历无妨是他们加入左联的基础,从报刊造血虽不是左联的唯一渠道,却可谓重要渠道。更多细节笔者将另文详述。

[88]陈海云,司徒伟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第6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89][93][94]徐懋庸:《“左联”情况》,《徐懋庸回忆录》,第191页,第74页,第193页。

[90][92]魏猛克:《回忆左联》,《回忆录》,第304页,305页。

[91]马子华曾描述:“我在这时期,写作量很大。初期,作品幼稚浅陋,政治思想也不成熟,写作的质量也不高,每写出一篇稿子,要拿给左联同志们提提意见;比较象样的,才替我推荐到刊物上发表。后来比较提高了一些,自己就直接投稿。以后,刊物报纸就向我索稿约稿了。”(详见马子华:《意气方遒》,《回忆录》,第251页。)

[95]鲁迅虽颇受黎烈文的尊重,不过从已有资料看,他只向黎直接推荐过徐诗荃一人,未推荐过左联作家。

[96]农:《鲁迅沈雁冰的雄图》,《社会新闻》1933年第3卷第12期。

[97]左联盟员的回忆中多有与鲁迅交往的相关片段。虽然这些回忆写作之时,鲁迅已经成了不容否认的“左联旗手”,这些盟员又多因鲁迅问题而在“文革”中备受折磨,故而部分早年与鲁存在矛盾的人在回忆他时 also 对其恭敬有加。但仍能体会到鲁迅在绝大多数左翼作家成长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引领提点之功。

[98]“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9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